

《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融通》

后疫情时代，全球的产业供应链迈向区域化、在地化、数字化的调整趋势，似已成形。愈来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需求，已不再满足于筑路架桥的项目。

这场疫情危机激活了数字经济，也为高新科技的市场出路预作铺垫。创新会是后疫情时代推动经济复苏的原动力。它涵盖科技、产能、制度乃至营商模式等多领域、多维度的创新。这也将是‘一带一路’迈进新发展阶段的里程碑。虽然‘互联互通’仍将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主轴，但‘五通’的‘设施联通’肯定不会仅限于传统的基础设施。

在疫后的新常态下，能够应付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势将成为‘一带一路’的新宠儿、新抓手。数字导向产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3D打印、机器人、数字贸易等新兴产业必将乘势崛起。传统产业要永续发展，也离不开高新科技的支撑。

这类数字化的新兴产能，恰是中国日趋成熟，领先他国的强项。其中尤以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

深圳，更是数字科技的发展基地，成就傲视世界。

[大湾区的蓄势待发]

在中国多个涉外对接的一带一路窗口，涵盖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珠三角9个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确是比较特出的一个。它融汇了日新

月异的科技创新、传统产能的厚植基础，以及制度创新的优势，构建了'一带一路'全球布局的新亮点。

这个人口超过 7 千万，是中国人均 GDP 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人文方面，它的对接面广，是广大海外老华侨社群的侨乡。因此海外关系千丝万缕，有其一定的人文优势。其中尤以穗（广州）、港、澳三地的涉外历史和洋务通商的经验沉淀，最为悠久厚重——广州在 1842 年五口通商之前即已存在一口通商；港澳则分别在 1842 年和 1553 年开始被英、葡租占，即开始了洋务的对接。

就地理的优势而言，它位处南海之滨，挟其临海的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南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不在话下。另一方面，整个大湾区也综合了粤港澳三地的互补性优势，即：深圳的研发创新科技；广州对接全球的贸易网络；香港的物流和金融服务；澳门的会展暨娱乐产业的光环，以及珠三角其它 7 个城市的高端制造产能。此外，作为前殖民地的港、澳地区，以其具备英、葡外语的优势，对接英、葡语系的国家，自是得心应手。

2019 年宣布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相较其它三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湾区（即：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都会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虽然起步较晚，可它的竞争力却足以比肩后者。根据香港贸发局 2015 及 2016 年的数据，粤港澳三地的空港旅客暨港口货柜吞吐量的总和，即已远远超越其他三处。

[深圳创新改革的再出发]

随着今年(2020年) 10月11日中国官方公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又迎来了新的机遇。若从大陆境外的视角来解读，成立已 40 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如今再赋予重任，成为了历史新阶段引领新一波'创新改革'的龙头。

40年来，因改革而兴的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再到当下进一步扩权赋能，比直辖市拥有更大的施政空间，率先成为首个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大陆内地与港澳特区的融合发展。

毫无疑问，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将会再次的华丽转身，成为一个汇集科技革新、产能革新、制度革新、理念革新于一身的崭新综合亮点。同时它也能以本身研发创新的优势来优化周边珠三角固有的传统产能，进而迈向高端制造。这会有助于提高珠三角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的生产总值，使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如果珠三角通过这模式能够成功挣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作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考模式。

显而易见的，深圳扮演的角色是多功能性的。它既是**创新改革的先行试点**，也是牵引周边地区相关产业革新升级的火车头。与港澳相连的战略位置，**更使之成为这两个特区坚实的后援基地**。这一切优势均与后疫情时代推进'一带一路'的布局需求互相契合。

[大湾区的目标导向]

随着产业供应链的日趋区域化、在地化和数字化，'一带一路'**就必须**针对性的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中国不同地域省市的产能和优势，精准的匹配全球不同地区目标国的建设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它的深耕聚焦必须针对性的目标导向。当前可供锁定的目标分别是以地域、产业和合作群体为考量导向。

目标导向（一）：地域目标

‘一带一路’布局全球，支点地域和沿线节点国当然不少。随着疫情爆发，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影响着国际秩序的蜕变，曾经浓墨重彩的支点地域不一定仍适宜作为疫后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同样的，过去的非焦点地域，或许今非昔比，基于战略考量，一跃成为有待深耕细作的焦点地域也未尝不可。

以当前受疫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衡量，疫后仍具活力生机的市场，当推亚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预测：今年（2020年）全球的经济，包括倍受瞩目的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的经济体，除了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率大幅减缓，其余的都会陷入经济萎缩，情况可能比2009年次贷危机的后遗症更为严峻。

这份报告也对2021年各国经济可能普遍回昇表示乐观。亚洲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东盟其中经济实力偏强的成员国，据其预测会超越欧美日等国的发达经济体。

在聚焦亚洲的当儿，中方要甄选重点的深耕地域，必须考虑的标准离不开战略的考量和外交关系的亲疏。以目前的形势看来，除了中国本土，境外东北亚的日韩两国，政治上备受美国的掌控，因此应该不会是首选。

南亚具有市场潜能的印度，碍于边境冲突导致中、印关系紧张，因此现阶段也还不是深耕之地。其他环印度洋的南亚国家，包括对华友好的巴基斯坦在内，其国内发展的需求，或许更能与中国其他省市的优势产能相互契合。

相对的，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今年（2020年）疫情肆虐，上半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额逆势增长5.6% [5]。首8个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值已达2.93万亿元 [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 [7]，超越同期中国与欧盟（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 [8]；与美国（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2.1%） [9]；与日本（占中国外贸总值的7%） [10] 的贸易总值百分比。这数据不仅让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也同时夯实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紧密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此时此刻，这对复苏饱受疫情重创的东盟经济极其重要。同时也为明年（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预铺了扎实的基础。

就地缘政治而言，这良好势头不单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从而抵消美国就南海水域主权的争议而刻意凸显的矛盾；同时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逆流中，更是树立了一块耀眼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样板。

与此同时，在中国构建中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预料将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动能。因为活络国内大循环将有力拉动内需，为东盟及其他贸易伙伴创造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时，深化同东盟的合作也将为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强劲的助力，为维护国际产业供应链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正面的作用。

其间，值得瞩目的中方外交表态是，前不久中国国务委员，也是中方资深的外交官杨洁篪曾明确表态中国高度重视东盟，将东盟的关系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并承诺中方会支持东盟设立抗疫基金和紧急医疗物资储备库，以及未来在疫苗研发和分配方面优先向东盟倾斜，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可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性重要抓手。东盟作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首个进驻点，自然应该是今后深耕细作的焦点地域。

中方不妨借此重新调整‘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趁疫情记忆犹新之际,以‘重整医护体系’为出发,借‘一带一路’为载体,按东道国所需,针对性的向外输出本身防、控、治疫的经验,同时帮助东道国建立本身的医护体系,并配之以基本资源的支援,以完善当地的医护系统。

简而言之,这“医护外交”可作为中国拓展软实力的另一试金石,它不同于“输出基建产能”,故不能纯以经济效益为考量关键。其实“医护外交”只要运用得当,它的地缘政治红利,当非经济效益所能比拟。

目标导向(二):产业目标

放眼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的布局,产业生态的重塑和洗牌似已无可避免。已初见端倪的,首推医用物资,尤其是个人防护装备和有待面世的疫苗。由于经过疫情的教训,医用物资的重要性已提高到战略物资的高度。全球个人防护装备的产业供应链,势必会重新布局。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胁迫和奖掖诱惑下,一些驻华的外资厂商外迁布点或无可避免,但同样的,中国也可挟其产能优势进驻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中外联手另辟新产业供应链的理想沃土。

至于其它管控大流行传染病的追踪系统,虽在西方国家或会引起侵犯私隐的争议,可它在发展中国家应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因此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高新科技可发展为中国下一波往外输出的重点。中方可借‘技术转移’、‘技术分享’等方式广结善缘、促进友谊。一方面既可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又可兼得地缘政治红利。

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普及,在中国已深植社会各阶层的移动支付,席卷全球重塑人类生活模式的日子应已到来。这会是中国下一波推进‘一

带一路’的理想抓手。盘点现有的相关资源，中国名列前沿的数字化科技，且可辐射全球的抓手自是不缺。惟须省思的倒是其落地的模式。

值此新的发展阶段，单纯的为新产业、新抓手开拓海外市场或传统的‘出海布点’，已逐渐不能因应当前的变局。发展中国家渴求开创本身产业供应链的意愿日益普遍，但本土产能的短板，始终还是个障碍。纯外资的进驻，虽能因应市场需求于一时，但任何只重市场效益，吝于技术转移的落地模式，毕竟有其局限。由于东道国社会的‘获得感’不强，这往往会成为当地民粹政治炒作议题的对象。中方不能不防。

在这前提下，中方可考虑以新模式出击，把移动金融、云计算、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已日趋成熟的科技产能，按海外市场条件的成熟度，结合地缘，走向世界。‘出海’的中资企业应该以本身的科技优势为基础，结合东道国当地的产、学、研领域资源，打造出具有在地人文色彩的新产品。这将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智造” (powered by China)特色，引领友好的节点国科技向前迈进。

可以预期的是，新兴产业群将把大湾区综合构建成为一个新的高新科技枢纽，以便辐射整个东盟，乃至全球一带一路的节点国。毫无疑问，这将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的项目抓手，并借“中国智造”的模式，让中国的智慧产品在全球遍地开花。

平心而论，要落实“遍地开花”可不是空话，它讲求的是软实力。中国基建、中国制造等这些年来举世认可，已无异议。中国产能，配上中国智慧，若能以“中国智造”的形态惠泽友邦，让战略伙伴分沾光环、与有荣焉，我相信这比任何形式的友好互动，更能融入东道国社会，进而为“民心相通”添砖加瓦；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加分。

目标导向（三）：合作群体的目标

地缘政治的博弈，不外是合纵连横的综合实践。它必须因时、因地、因事而异。这些年来，区域性合作组织，如：东盟、欧盟和非盟一直是中国涉外对接的重点，这是外交布局所需。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外交亲疏关系起了变化是意料中事。与西方国家的不稳定关系，促使中国更应该深耕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重续与传统伙伴相互扶持的前缘。其中，当年G77---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NAM)和南南合作的国家等的对华友好关系，是时候受到优先的考虑，以作为疫后振兴经济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基本盘。这不能错误解读为“对外援助”的对象，当然也不是旨在牟利的目标市场。相对的，这些组织是可供聚焦深耕的合作目标群。

‘一带一路’并不单纯是跨国的经济大项目。它的成败离不开地缘政治的角力。这些年来，中国深度的融入国际社会，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惠者。它捍卫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是情理中事。然而这框架下的游戏规则有其时效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中方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化智慧，主张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是广得‘人和’。‘一带一路’倡议即是最好的推手。

开局的‘大写意’阶段，广得多个国家的呼应和参与，是个良好的开始。它受到美国与若干国家的敌意抵制和污蔑，正好折射出它所发挥的地缘影响力。经此一疫，这种外部的打压预料将会加剧，同时没有底线，且来自多方面。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不管喜欢与否，由美国挑动的体制竞争，预料会日趋激化。即便中国无意闻声起舞，但在捍卫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巩固‘一带一路’基本盘还是必需的。

[港澳特区“两制”的妙用]

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少不了舆论的交锋。由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日子尚浅，不像美国，稳操语言和话语权的优势。再说，现有国际秩序的规则概由**美国**制订，这方面中国容易处于被动。处于当前的大环境，纵使中方无意与美国争锋，但为自己开拓国际话语权的空间，并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还是迫切需要的。

从**海外**的视角来看，中国当前亟需更多境外理性且有组织性的舆论声援，以适时反驳并纠正日益猖獗的恶意歪曲和刻意丑化。这与国内现有的党建文宣和全盘正面报导的媒体生态完全不同。中方需要的是常驻境外却又不隶属于体制内的‘友华’智库和媒体，为自己发声。基本条件是，这些载体必须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并赋予创作和话语的自由空间，才能有所作为。

环顾周遭，目前能够同时无惧于**外国法律**羁绊，又不受国内法规约束的理想地点，舍港澳其谁？

自从主权回归以来，港澳特区‘一国两制’的治理，利弊各有褒贬。常有争议的“两制”产物是，港澳地区的媒体和社团组织生态，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乍看似是消极因素。此前西方势力也确是凭借这两种载体在特区兴风作浪。但往深处想，难道同一片土壤就不能转化为祖国发声的基地吗？

这些年来，港澳两地的创意产业人才荟萃，当地创作的自由度成为了吸纳人才的亮点。的确，商贸的营销模式需要创意，才有理念的革新。国际关系的经营，乃至国际舆论的交锋，又何曾例外？

中方不妨考虑在大湾区的框架下，以港澳特区的“两制”优势，延揽擅搞国际公关与创意的各路专才，以便在当地创建独立智库、媒体或其他创作平台，为中国仗义发声，另拓话语权空间。同样的方式也适用于厚植“软实力”，为中国加分。今日的中国，其“硬实力”已名列前茅。然而在日益诡谲的大国博弈中，中国绝不能让软实力的短板成为自己的软肋。

港澳两地的主权已分别回归多年。既然作为特别行政区，并已赋予“一国两制”的地位，就应该尽用其优势，作为支援祖国的后花园，而不是任由‘两制’备受滥用，最终沦为阻挠“民心回归”的绊脚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一国两制’元素有其可取的优势。这是中国其他省市所欠缺的。与之毗邻的深圳，如今获得中央的赋能，再攀改革创新的高峰，在社会与经济层面，有融合三地人心与产业之效；在创意产业方面，它被赋予创新的自主权，无疑是为港澳特区预拓后勤基地，为培植人才梯队而预作准备。

#结语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横空出世，一方面固然是要加速港澳特区与大陆内地的融合；另一方面，在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之余，它会迅速崛起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枢纽，同时也是中方化解外部势力对现有产业链绞杀的一步妙著。

诚然，粤港澳大湾区任重道远，又岂仅是要比肩世界其他三大湾区这么简单！

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

2020-12-3@吉隆坡